

第四章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现

在东洋航路和南洋航路上，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往由来已久，但以上交往多以迁徙、战争、朝贡等形式开展，既无连续性，也无固定路线，更未以商品交换和贸易为主要目的。及至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才正式开辟了由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远洋贸易航线。自此，由北部湾地区出发，以丝绸贸易为象征，行经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迅速兴起。考古发现的香料、玻璃器、各类珠饰及一些非贸易商品，从实物资料的角度呈现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景象。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与传播之路，一些域外文化因素经过模仿改造，也逐渐融入本土文化中，形成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古代的海外交通有东洋航路和南洋航路。东洋航路上，有秦始皇时期徐福东渡入海求仙人和神药的传说，有秦末齐人曾为“避苦役”而大批渡海“适韩国”，以及西汉时期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等记载，《汉书》和《后汉书》中也有多处关于“倭”的记述，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交往；南洋航路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往也由来已久。上述种种，多为迁徙、战争或朝贡等，缺乏连贯性，经行路线也不同定，更无明确的贸易意愿和商品交换品种，应归入考古学文化交流传播的范畴。

汉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南平两越，北击匈奴、通西域，开发西南夷，东定朝鲜，建立了空前辽阔的疆域，是汉朝的极盛时期。汉武帝积极开拓的中亚商路，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陆上丝绸之路”（或称“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时常发生动乱，忽通忽断，而且安息商人为了牟取暴利，故意从中阻隔，虽经张骞出使，历经艰难，但也难以改变这种多变的局面。汉武帝遂又采纳张骞通过“蜀身毒道”，先与印度接触，再从印度出发直达中亚的建议，但这条通道要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沿途多原始森林、深山峡谷，大都是崎岖山路、栈道索桥，稍有骚扰，商路便会被阻断，比西北的商路更难保障其畅通。所以，张骞生前始终未能打通此道。^[1]及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此前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在秦三郡的基础上分置为九郡，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开通一条从北部湾畔的合浦郡出发，与西方往来的海洋通道。于是，北部湾地区一跃成为汉朝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合浦港便成为这一航线的始发港。

汉武帝时由官方正式开通的这一南洋航路，即人们所称狭义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有详尽的记载，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

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景佑、殿本都作“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2]

这段文献所述的年代应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合浦等北部湾地区设立郡县至更始三年（23年）王莽的新朝结束，主要内容是汉朝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海路交往和贸易情况，使团的航线、航程和交易商品等尤为详尽。可据此归纳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五个特征：一是线路相对固定。从北部湾畔出发，大致沿岸前行，经由马来半岛，抵达今印度和斯里兰卡。二是官方主导，民间参与。黄门隶属于少府，由其下的“译长”率领，也有部分敢于冒险的商人——“应募者”加入。三是主要进行商贸活动。携去“黄金杂繒”，买回“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是双向行为，而非单方面输出。四是伴随着国家之间的朝贡和外交活动。提及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来献见”，但王莽也是先“厚遗”，才“令遣使献生犀牛”，也未提及汉王朝对其进行册封等，故与严格意义上的朝贡制度有所不同。五是和平之路。不使用战争、掠夺等手段，途经的国家还提供食物和陪同人员，甚至出现“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友好场景。

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基于各国的官方保障，由此决定了其为政府行为的属性，如陆上丝绸之路以张骞受命“凿空”西域为正式开通，上述汉武帝开通从北部湾地区出发的远洋贸易航线，以丝绸贸易为象征，官方主导，民间参与，路线相对明确固定，且对日后中外交往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年代上限。从这一意义上说，合浦郡的徐闻、合浦两港，无疑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

二、沿线考古发现及航线复原

学术界对《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解读，最大的争议是沿线国家或港口现今的地理位置，正所谓“所难知者仅为汉使所历之国，诸国名经两千年之传写，难保毫无讹误，故历来诸考据家几人持一说”^[3]。

之前学者的考据，以文献释读见长，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海洋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个别学者还运用了考古资料加以佐证，但受制于当时的考古发现及学者的学术背景，也偶有资料运用不当的情况。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通过地层学、类型学等手段，研究和复原古代社会的实证学科，而沿线港口或古国作为高级聚落形态，必定有较大型的墓葬群、居住址或城市遗存，因此，从我国及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出土资料入手，通过物化的遗迹和遗物，厘清与海上丝绸之路记述年代相当的“点”，

进一步连“点”成“线”，或许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汉书·地理志》中提及的港口和古国先后有徐闻、合浦、日南、都元、邑卢没、谿离、夫甘都卢、黄支、已程不和皮宗。对于沿线古国的政体，目前尚不明晰，芒甘(Pierre-Yves Manguin)甚至提出许多东南亚国家是城市国家，而非领土国家。无论如何，那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港口城市，都被认为是古代“全球化”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因这些港口与后代航线发展的关系密切，故有必要从考古发现的角度出发，结合前人的研究，对它们现今的地理位置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 徐闻

徐闻为合浦郡属县，“汉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4]。港口的职能是囤积进出口货物，汉代设“左右候官”，应是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商人、管理外贸货物、稽征进出口商品税费等的官员，与西北边塞的候官全面履行军事、行政和司法职能，应有所区别。黄启臣、阮应祺、张荣芳、吴松弟等学者还从历史学角度对徐闻港的重要历史地位等予以阐述。^[5]

徐闻没有内河与内陆相通，其功能主要是作为沿海航线的补给港，货物的集散能力很有限，因而决定了港口的规模不大，遗存不多，考古发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1973年冬至1974年春，广东省博物馆在琼州海峡北面的华丰村、红坎村和槟榔涡村三地发掘了51座东汉墓，并认为汉代徐闻城在华丰村西南3千米处的七旺村一带。墓葬出土了珠饰308颗，包括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多与海路贸易相关。^[6]不过，七旺村一带并没有更早的遗存发现，无法显示其与西汉徐闻港之间的关联性。

1993年10月至11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前期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仕尾村、二桥村和南湾村一带的汉代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墓葬、房屋遗迹、水井等，出土器物以陶器和瓦类为主，也有极少的铜器、铁器和石器。发掘者把二桥村遗址年代的上限、下限分别定在西汉早期、西汉中期。^[7]又因这里地处海湾，发掘者其后撰文，认为二桥村遗址附近即为徐闻港所在地。^[8]

汉代徐闻县地域广大，辖今整个雷州半岛。作者曾数度前往调查，发现在遂溪县杨柑镇流入北部湾的杨柑河两侧，分布着多处几何印纹硬陶遗存，与合浦大浪古城等年代相当，为西汉早中期。值得重视的是，1984年在遂溪县郊江湾村还发现一处南朝时期的窖藏金银器，出土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币约20枚和莲瓣银碗1件等，或能从侧面说明遂溪与海外交往的传统。而且，二桥遗址仅发现小型墓葬3座，与居址的体量尚不匹配，还需继续开展考古发掘。今后寻找西汉徐闻港的考古工作，也应开阔视野，对现遂溪县乃至汉代徐闻县所辖的整个雷州半岛区域，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合浦

合浦是两广入交州的枢纽，从中原入交州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大都以合浦为中转站。作为汉文化输出的前沿地带，合浦的重要地位还表现为，一方面接受外来商品和文化因素，另一方面生产出融合当地文化特征的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甚至内陆地区流通和传播，从而推动整个文化发展的进程。与徐闻港相比，合浦港具有徐闻港无法比拟的优势，影响大于后者是显然的。《汉书》载合浦县之“有关”，有学者理解为合浦有了海关，是我国第一个海关的设置地。^[9]事实上，记载的“关”，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海关”，主要是负责稽查行旅和来往商货的管理机构，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合浦的外贸兴盛，确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繁荣的始发港之一。

合浦港相关的考古工作，分为墓葬和城址两部分。截至2013年底，合浦发掘的墓葬数量已超过1200座，其中以汉墓居多。汉墓出土文物丰富，不少与海路贸易有关，其中包括我国目前发现汉代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的各类珠饰。城址的发掘始于2002年，广两文物工作队成立了“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工作重心从墓葬逐渐向城址转移，在大量考古调研的基础上，陆续开展大浪古城和草鞋村遗址的勘探和发掘。初步考古研究表明，这两处均为汉代城址，是两汉时期合浦港的先后所在地。

（三）日南

日南是汉代位置最南的郡，西汉初置时，其辖境约当今越南中部的广平省至富安河一带。“自日南障塞”中的“障塞”，即边塞险要处防御用的城堡。《汉书·地理志》的记述，是指徐闻、合浦两港出发的船只自此离开国境，所表达之意，并不是把日南当作始发港。

越南中部开展的田野工作主要集中于东南亚金属时代的沙莹(Sa Huynh)文化遗址，该文化遗址是在近海的广南省发现瓮棺葬遗址后命名的。秋盆河谷出土的铜镜、铜盆和几何印纹硬陶等，表明该地区与越南北部及汉朝的密切关系，而发现的大量珠饰则显示出该地区与东南亚其他地区及印度、西亚的贸易和交流体系。从考古发现来看，秋盆河谷是沙莹文化遗址发现的集中地区，有会安河出海，应是日南的行政中心和港口所在地。

秋盆河谷主要分布有两个遗址群。一个是会安遗址群，位于河流的北岸，主要有莱宜(Lai Nghi)等几处瓮棺葬遗址。在莱宜发现的墓葬共63座，出土器物非常丰富，随葬品有陶器、铁制工具和武器，还有包括镜、响铃、五铢钱、手镯、容器在内的铜器，以及由各种玉石、玻璃或黄金制成的珠饰和耳饰。出土的10000多颗珠饰中，仅肉红石髓珠就有1000多颗。从出土的肉红石髓狮形珠、青铜容器、铜镜等器物来看，多与合浦风门岭墓地相似，显示了两地之间的密切关系。结合碳-14年代测定，莱宜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最晚的器物年代相当于我国的东汉早期。^[10]另一个是Mau Hoa遗址群，

位于河流的南岸，其中 Go Ma Voi 墓地和 Thon Tu 居址已进行数次发掘。Go Ma Voi 墓地揭露瓮棺葬约 50 座，出土陶器 250 件，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墓地沿用时间为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11] 在 Thon Tu 居址，发现铜炉渣等当地从事青铜器铸造的证据。^[12] 此外，越南和英国的考古学家于 1993 年也对 Go Ma Voi 墓地东北数千米处的查乔邨州山遗址 (Bun Chau Hill, Tra Kieu) 进行了发掘，出土文物也很丰富，主要是粗陶，几何印纹硬陶也很普遍，筒瓦和人面纹瓦当数量较多，还发现少量玻璃单色珠、蜻蜓眼珠和残片等。遗址显现的文化因素复杂，除当地占族因素外，还有汉式印纹陶，以及印度轮制陶片 1 片。对于该遗址，“我们几乎确认沙莹史前文化、早期‘印度’因素、扩张至越南中部的汉文化及林邑国早前占族之间的‘分界面’”^[13]，这个“分界面”的表述，倒与日南障塞所处的位置十分吻合。

(四) 都元

都元是航线经过的第一个国家，其故地之前有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二说，各说之下又有多个不同地点，陈佳荣等编著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考释，以下诸家观点均引自此书。^[14] 蒋国学在韩振华和程爱勤等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都元国位于俄厄 (Oc Eo)，亦即越南南端的迪石一带。^[15] 但发掘与研究结果显示，俄厄遗址年代较晚，与《汉书·地理志》所指向的时段并不相符。

最新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将都元国的位置指向与越南交界的柬埔寨湄公河下游一带。这里集中发现了较多公元前 400 年至公元 500 年的遗址，吴哥博垒村遗址 (Angkor Borei) 就是其中之一。吴哥博垒村遗址位于茶胶省的湄公河西岸，发掘显示，最晚到公元前 400 年，这里已经有人定居，并逐渐成为湄公河下游的聚落中心，其居住的人口于 6~7 世纪到达顶峰。另在距吴哥博垒村遗址不远处河流上游的波萝勉省村庄波赫 (Prohear)，2008~2011 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 100 年间的 69 座土坑墓和 7 座瓮棺葬，出土了大量遗物，包括 33 面铜鼓和大量的金银制品及约 3000 颗玻璃珠和石榴子石、肉红石髓、玛瑙串珠。^[16]

很多研究东南亚的学者相信，吴哥博垒村遗址之后是扶南国的都城。^[17] 我国史籍记载也指向这一带，《南齐书》曰：“扶南国在日南之南、大海西湾中，广袤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18] 这里的“大江”当是指湄公河。《梁书》中都城的位置更具体，“城去海五百里”^[19]，按汉 1 里的长度等于如今的 415.8 米^[20] 计算，为 200 多千米，也与吴哥博垒村遗址入海的距离相当。扶南国建都吴哥博垒之前，当地已显示出复杂的社会组织，可能就是《汉书》中提到的“都元国”。其后扶南国时期挖掘的从湄公河通往迪石湾的运河，不但沟通了湄公河下游原都元国的内河地区，而且可以绕过金瓯角，使南海与暹罗湾之间的航行更为安全和便利。

（五）邑卢没

邑卢没的故地多认为在缅甸伊洛瓦底江口至莫塔马湾沿岸一带，或在缅甸的勃生、勃固至萨尔温江下游，或在孟邦的直通及其附近。朱杰勤、黎光远则认为在泰国的曼谷湾附近的华富里和叻丕。^[21]

据中国古籍记载，9世纪以前在今缅甸境内建有牒国。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在缅甸沿岸、悉利城、蒲甘城和今缅甸中部，以及掸邦西南部、克耶邦、勃固省、德林达依省等地，都发现了牒人活动的遗迹，城址有毗湿奴、汉林、室利差坦罗、迈莫、达格拉等，年代从1世纪晚期至9世纪。其中毗湿奴代表了牒人的早期文化，室利差坦罗代表了牒人的后期文化。至于若开地区，可以肯定的是1~2世纪由印度逃亡来的贵族才开始在此建国。^[22]后汉称缅甸为掸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及掸国王于永元九年（97年）、永宁元年（120年）和永建六年（131年）三次遣使来汉，至少也是1世纪末的事了。因此，公元前2世纪后期的邑卢没国在现缅甸境内的可能性并不大。泰国湾附近发现不少铁器时代遗址，而聚落规模比较大，且出土遗存丰富的，迄今也仅限于班东塔碧(Ban Don Ta Phet)遗址一处，该遗址附近一带很可能与这个古国有关。

班东塔碧遗址是位于泰国中西部北碧府和素攀府乌通地区之间，经过三次考古发掘揭露的一处墓葬，出土了铁制工具、武器，青铜容器，各种青铜、骨、象牙、玻璃及半宝石珠子。^[23]该遗址出土的珠子和一些青铜容器，表明在这一时期印度和泰国之间的贸易中，其他比较丰富的物品，如低温陶器和锻造的铁制工具、武器，完全是当地出产的。班东塔碧遗址还发现了3000多颗玻璃珠和玛瑙、水晶、软玉等半宝石珠子。从与西方联系的视角来看，最有趣的是绿色六棱柱玻璃饰，相似器物发现于巴基斯坦的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塔克西拉遗址和印度北部一些遗址，以及越南俄厄遗址、泰国北部班清遗址等地，很可能是在印度制造，然后通过贸易进入东南亚。另在班东塔碧遗址发现50多颗蚀刻石髓珠与1件雕刻成跳跃狮子的玛瑙垂饰，几乎可以确定起源于印度。那里还发现软玉双头兽饰，则是越南中部海岸地区沙莹文化所独有的工艺品，说明了该地区在东南亚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出土的青铜手镯和响铃等，则有力地证实了该地区与中国的交往。此外，在班东塔碧遗址还发现附着在铜器上的一些麻、棉或丝织品残留痕迹。

（六）湛离与夫甘都卢

关于“湛离国”和“夫甘都卢国”的现今位置，石田干之助、许云樵认为位于克拉地峡两侧，该观点很值得重视。^[24]克拉地峡横跨泰国春蓬府和拉廊府境内的狭长地带，是马来半岛北部最窄处，并且它的东西海岸皆为基岩海岸，风平浪静。顺着地势比较平坦的路线横穿，大约100千米，“步行可十余日”，与穿过克拉地峡所需的时间亦正好相合，弃船步行至地峡的西侧后，转而海路，才需“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这一分析结果吻合文献

记载，也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在克拉地峡两侧，考古发现了众多的遗址。东岸春蓬府发现的三乔山(Khao Sam Kaeo)遗址，出土了西汉铜镜和印纹陶器、印章，还有印度风格的轮制陶器。^[25]该遗址的珠饰原料包括高品质石髓(数量最多)、玛瑙、玉、紫水晶、白水晶和比较罕见的石榴子石，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加热或未加热的原材料、粗坯、初加工的成品、未穿孔也未磨制的装饰品、废品和一些可以认为是出自学徒之手的残片。三乔山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是东南亚已知最古老的城市及印度和东南亚之间贸易的一个早期重要连接点。考古学家还注意到了三乔山与班东塔碧当时是有密切联系的。^[26]西岸拉廊府库拉武里区的邦罗村(Bang Kluay)遗址，也发现陶器和其他汉式的中国器物，且大面积发现玻璃珠和宝石珠。^[27]在汉代，克拉地峡毫无疑问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谶离国与夫甘都卢国应分别位于地峡的两侧。

从近代起，在克拉地峡开凿一条运河，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一直是宏伟的蓝图。1677年，为攫取东西方贸易利润及在中南半岛与缅甸争雄，暹罗国国王提出开凿克拉运河的计划，但囿于当时的人力、财力和技术，计划未能实施。此后，克拉运河被当作战略枢纽，世界各国学者、智库、战略研究机构一直进行追踪研究。^[28]修凿运河从克拉地峡通过，可比绕道马六甲海峡缩短900~1200千米，不仅能大量节省油费和时间，还能规避海盗侵扰，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殊不知，这一便捷的通道在汉代就已广泛使用，使因选择弃船步行通过这里，再换船继续前行。B. Bellina等西方学者估计，按当时的航速，可节省四个月的时间。^[29]

(七) 黄支

黄支通常被认为在印度东南部泰米纳德邦的康契普腊姆，其南面约100千米处有著名的阿里卡梅杜(Arikamedu)遗址。阿里卡梅杜是当时的贸易大港，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提到的著名港口波杜克。1996年，贝格利(Vimala Begley)发文，对其发现进行回顾，谈及了一些新的认识。^[30]贝格利认为，尽管阿里卡梅杜的海路贸易可能在公元前1世纪初期就开始，并持续到1世纪或2世纪初期，但黄金时期却是从公元前1世纪中期至公元1世纪中期。

阿里卡梅杜遗址分为北区和南区两部分。有证据表明，整个贸易时代这两个区域的定居范围都在扩大，刺激增长的动机显然是商业。南区出现最多的建筑形态是用砖块垒砌而成的围墙，早期的发掘者认为是贮水池，但可能更具商业用途，如存储工业或农业产品。卡赛尔发现一些小型作坊沿着贮水池北墙分布，里面出土了金属器及玻璃、半宝石、象牙和贝壳等装饰品。南区最重要的发现是陶器，出土大量的罗马赭色黏土陶器碎片及多种形制的其他陶器器皿，表明南区存在居住区、工业区和市场。北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港口设

施所在地。莫蒂默·惠勒在北区发现了砖砌的围墙，他认为可能是仓库遗址。他还发现了残存的木材、绳子和其他材料，因此认为早期的港口设施是木结构。贝格利还发现了水井。出土器物中最多的陶器残片，集中于北区的最北区域，器类较多，有烹饪器皿和餐具盘、碗。地层里发现了罗马赭色黏土陶器和安佛拉罐，证明这一地层堆积年代为地中海贸易时期。因此，如果北区的最北区域是港口，那么这里的一些空间可能居住着商人或水手。此外，日常使用的陶器有粗陶器和细陶器之分，表明存在社会或经济分层。

（八）已程不

已程不国的故地多谓在今斯里兰卡，当时主要的港口在今曼泰(Mantai)一带。曼泰坐落在斯里兰卡两北角，以保克海峡与印度次大陆相隔。保克海峡平均水深2~3米，最深处仅9米，海底有许多暗礁相连，也称“亚当桥”。

曼泰的战略位置尤为引人关注，它雄踞近东与远东之间主要的航海通道，同时又是印度南部与斯里兰卡之间的一个主要接触点。曼泰作为港口的漫长历史可以证明它在斯里兰卡的历史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语境下，曼泰遗址对任何有关印度洋贸易及亚洲经济史的研究都非常关键，就海上贸易而言，曼泰的地位独一无二。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考古工作者就开始对曼泰遗址进行了零星的试掘，之后的1980年、1982年和1984年，共进行了三期正式发掘。^[31]

曼泰从事国际贸易的更多证据在出土器物中得以体现，这些出土器物显示了东西方之间曾经的交流。曼泰遗址以东是马纳尔湾著名的珍珠海岸，珍珠始终是当地主要的出口商品，完整的和经钻孔的珍珠在发掘中均有出土。根据斯里兰卡最古老的文献，该岛一直以开采和出口各种宝石、半宝石而驰名。在曼泰遗址出土的宝石，既有加工成品，也有未经琢磨的原石。曼泰遗址出土的珠子为曼泰的对外交流提供了有力证据，彼得·弗朗西斯分类整理了各等级标本2500余件，在用料、制造技术和跨地区传播上，它们展现出了广泛的多样性。毫无疑问，曼泰曾是一处重要的珠子产地，尤其是对印度—太平洋珠而言。关于这种玻璃珠的制造，最早记载是在阿里卡梅杜，其在曼泰的生产持续了1000多年。这种珠子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西至东非，东至朝鲜。上述宝石和玻璃珠饰，也是当时出口到汉朝的主要器物。但迄今为止在曼泰遗址发现的中国器物则多晚至唐代。白瓷和越窑瓷器的碎片较为常见，烧制于长沙窑的典型釉陶侈口壶，常装饰有模印浮雕贴片，贴片上有葡萄串、鸟类、狮子和其他动物，还有头戴塌软帽子的西亚胡人等各种形象。曼泰遗址还出土了典型的三彩陶片和一种带绿釉散点装饰的器物，它们同样产自中国。

（九）皮宗

皮宗故地，位于马来半岛西南岸外的皮散(Pisang，马来语意为香蕉)岛的观点提出

较早，引用亦多。^[32]这个面积仅 154 公顷的小岛，迄今尚无任何考古发现的报告，当时是否有固定的居住人群，也尚未可知。马来半岛西海岸最重要的遗址有海岬拉瓦、瓜拉士林星和霹雳州，放射性碳测年表明遗址的年代较晚，为 3 世纪至 7 世纪或 8 世纪，与考古发现基本一致。

《汉书·地理志》把“皮宗”单独置于回程路线中提及，其位置应是在去程未经过的克拉地峡以南，方符合汉语表述的先后顺序和习惯。从考古资料来看，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及新加坡一带，可能性比较大。

在柔佛河上游和中游一带，分布着许多出土中国陶瓷片的古代遗址，其中最出名的为哥打丁宜(Kota Tinggi)。哥打丁宜位于柔佛河中游，马来语的原意为“高城寨”或“高港”，该地为 16~18 世纪柔佛王国的都城旧址。在这里出土过唐宋明瓷片，尤以明代瓷片居多，以印纹陶为代表的古代陶片也有发现。韩槐准收集了一批陶片，共 164 片，除哥打丁宜出土的外，还有马六甲出土的 3 片。这批陶片根据质料和纹饰，分为印纹陶和划纹硬陶两种类型，其中以印纹陶居多。安志敏研究认为，印纹陶是在邻近地区文化影响下在当地制作的，划纹硬陶很可能是通过贸易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输入的，年代应为 1~3 世纪。^[33]此类划纹硬陶，普遍发现于我国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使用年代跨度很大，上限可至春秋战国，从这个角度来看，哥打丁宜出土的这批陶片，年代或许更早，早至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汉武帝时期。

上述东南亚和南亚的遗存，尽管还不足以全面复原这些古国的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但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梳理和初步研究，仍能以之框定海上丝绸之路所经古国的大致位置，把航线的一些关键节点连接起来，从而勾勒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示意图^[34]。因汉代的船只较小，难以抵御巨大的风浪，故一般是沿岸航行，而在这一航线的马来半岛一段，往返应选择了不同的路线。返程走海路通过马六甲海峡绕过半岛，可能是基于交往的需要，更有可能是出于贸易利益的驱动。克拉地峡以南的泰国南部，如空统和塔差纳等，以盛产珠饰而闻名。这一带，在南亚与东南亚、东亚的奢侈品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最后，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汉使团航行经过的完整路线，但俗话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粟”，在日常民间贸易中，长距离运输是不切实际的，因而大多为接力式的就近贸易。由此，也不难理解，这一官方航线之外的番禺及可能因不是始发港口的交趾，便没有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被提及。前者在《史记》《汉书》中被称为“都会”，后者著名历史学家马雍在《西域史地文物丛考》中有概括：“其地位与敦煌相等，不过一在陆路，一在海路而已。”^[35]从文献记载和两地出土的众多舶来品仍可看出，当时可谓商贾云集，域外物产荟萃。毫无疑问，作为汉朝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交趾和番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港中，地位极其重要。

三、合浦汉墓出土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

按《汉书》所载，使团“赉黄金杂繒而往”，明确贸易输出的是黄金和各类丝织品。而“赉，赐也”（《说文解字》），说明官方携带的这些物品，源自朝廷的赏赐。陆路的输出亦大抵如此，如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300人再次出使西域，就“赉金币帛直数千巨万”（《汉书·张骞传》）。而输入的物品，有“明珠”“璧流离”和“奇石异物”，结合合浦汉墓出土文物考察，应包括珍珠、玻璃珠及石榴子石、水晶、琥珀、绿柱石、玛瑙、肉红石髓、蚀刻石髓、绿松石和黄金等珠饰。从出土数量众多的陶质和铜质熏炉来看，香料也应属“异物”中的一种。此外，一些非贸易商品，如出土的波斯陶壶和铜钹等，也随之传入。

双方贸易的物品，除丝织品和珍珠属于有机物，易腐朽而无实物遗留外，其余种类在合浦均有发现，主要出自合浦大中型墓葬，年代跨度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但大量出土则集中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墓葬。这些墓葬的随葬品多较丰富，墓主人可能属权贵阶层，包括官员和殷实商贾等。

（一）金饼

1971年发掘的合浦望牛岭1号墓，出土2枚金饼（图4-1），一枚重249克，直径6.3厘米，刻一“大”字，“大”字下方有“太史”二字；另一枚重247克，直径6.5厘米，刻一“阮”字，“阮”字上方还有一个“位”字。[36]金饼方便远程携带，可用作交易的大额货币。同一时期印度与希腊之间的贸易中广泛使用黄金，这类金饼或是记载中的“黄金”之属。



图4-1 金饼（望牛岭1号墓）

汉朝的黄金储备丰富。新莽时期，国家库存黄金达“七十万斤”（汉斤，折合现在的17.5万公斤），是封建社会中央政府黄金储量的顶峰，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当。[37]合全国计，当武帝至王莽时，“宜有百万斤以上”。[38]汉代盛行使用黄金，光是帝王用于赏赐和馈赠，《史记》《汉书》所载“赐金”“馈金”，动辄数万斤，少者亦有数百斤、数十斤。故赏

赐汉使团，用于海路贸易之黄金，其数量亦应比较充足。但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迄今还没有金饼出土的报告。究其原因，除考古发现本身的局限外，还可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盛行黄金珠饰有关。这些金饼，可能回炉重熔，制成了各种各样精美的装饰品。

(二) 玻璃

在未被破坏殆尽的合浦汉墓中，有约 100 座出土了玻璃器，有装饰品和器皿两类。装饰品主要为串珠，单座墓葬出土往往达数百到数千颗，其他还有棱柱形饰、耳珰、环、璧、剑扣等；器皿类较少，仅见杯、碗和盘三种。经考古学研究和科技分析，除我国传统的铅钡玻璃和高铅玻璃外，还有三个体系来自域外，一是产自东南亚的低铝和中等钙铝钾玻璃，二是产自南亚的中等钙铝钾玻璃，三是产自地中海地区的钠钙玻璃。

相对较明确的从东南亚输入的器物，有文昌塔 1 号墓出土的角轮形玻璃环(图 4—2:1)和黄泥岗 1 号墓出土的湖蓝色玻璃杯(图 4-2:2)；来自印度的器物，有文昌塔 70 号墓出土的淡青色玻璃杯(图 4-2:3)。其他经测试为中等钙铝钾玻璃的，如风门岭 26 号墓出土的六棱柱玻璃串饰(图 4-2:4)和铜红珠，也应为从印度输入。来自地中海地区的钠钙玻璃，俗称“罗马玻璃”，合浦的发现主要为串珠和碗，年代最早的为西汉晚期。寮尾 17 号墓出土的 20 颗(其中 1 颗保存较差，仅存残片)钠钙玻璃串珠(图 4-2:5)，以钴着色，颜色为深蓝色，半透明，在光照下泛紫色光泽，外观上与深蓝色的钾玻璃珠判然有别。1987~1988 年文昌塔汉墓出土单位不详的 1 件玻璃碗(图 4-2:6)，与日本美秀博物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珍藏的器物相近，应是从地中海地区辗转输入。



1. 角轮形玻璃环(文昌塔 1 号墓)



2. 湖蓝色玻璃杯(黄泥岗 1 号墓)



3. 淡青色玻璃杯(文昌塔 70 号墓)



4. 六棱柱玻璃串饰(风门岭 26 号墓)



5. 钠钙玻璃串珠(寮尾 17 号墓)



6. 玻璃碗(文昌塔汉墓)

图 4-2 域外输入的玻璃器

(三) 奇石异物

1. 石榴子石珠饰

合浦出土了石榴子石珠饰的汉墓，经初步整理统计，共有 10 座。出土的石榴子石珠饰颜色为紫红色，根据形状分有圆形、扁圆形、双锥形、多面榄形和系领形珠饰，以及狮形饰、摩羯^[39]佩等。九只岭 5 号墓、6A 号墓和第二炮竹厂 14A 号墓、第二麻纺厂 23 号墓出土圆形珠；凤门岭 10 号墓除出土圆形珠外，还出土摩羯佩 1 件；氮肥厂 1 号墓出土系领形珠饰（图 4-3:1）；凸鬼岭汽车齿轮厂 6 号墓出土狮形饰；第二麻纺厂 4 号墓出土多面榄形、圆形、扁圆形和系领形珠饰。石榴子石珠饰的尺寸不大，圆形珠直径一般为 0.4~0.6 厘米，最大者达 1 厘米；系领形珠饰和多面榄形珠饰长度为 0.6~1 厘米；狮形饰长 1.1 厘米，高 0.9 厘米；摩羯佩长 1.1 厘米。

汉代及更早时期，印度、斯里兰卡是石榴子石加工的一个重要地区。经检测，合浦出土的石榴子石珠饰属铁铝榴石系列，与印度等地出土的相同。上述器形的石榴子石珠饰，在印度阿里卡梅杜遗址等均有发现。^[40]合浦出土的石榴子石珠饰大都应来自南亚，部分可能在东南亚加工后输入。

2. 肉红石髓、玛瑙和蚀刻石髓珠饰

这三类珠饰均属玉髓类矿物，在合浦汉墓中的出土数量较多。肉红石髓串饰有榄形、圆形、扁圆形、双锥形、系领形、瓜形、葫芦形等，动物形状有摩羯形、狮形（图 4-3:2）、鹤形、虎形和鹅形等。堂排 2 号墓出土的鹤形、狮形串饰（图 4-3:3）共有 11 枚，其中鹤形 5 枚、狮形 6 枚，其用圆雕技法简练地表现动物的各个部位，构思巧妙，形态生动。玛瑙珠饰有串饰、戒指、扁圆坠、剑扣等，多为缟玛瑙，纹理自然流畅，散发玻璃和油质光泽，如红岭头 3 号墓出土的玛瑙串饰（图 4-3:4）。玛瑙珠饰偶见黑褐色和红白间杂的类型。蚀刻石髓珠饰在合浦汉墓出土很少，主要为在原色基体上蚀刻白色条纹，其中文昌塔生资仓 1 号墓出土的蚀刻石髓扁平系领形珠饰（图 4-3:5），制作精美，十分具有代表性。

高质量的肉红石髓、玛瑙和蚀刻石髓珠饰是铁器时代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合浦出土的珠饰，应多为从印度或东南亚输入。戒指、剑扣等我国传统饰品，则可能为通过输入原材料加工而成。



1. 石榴子石系领形珠饰（氮肥厂 1 号墓）



2. 肉红石髓狮形串饰（风门岭 26 号墓）



3. 肉红石髓鹅形、狮形串饰（堂排 2 号墓）



4. 玛瑙串饰（红岭头 3 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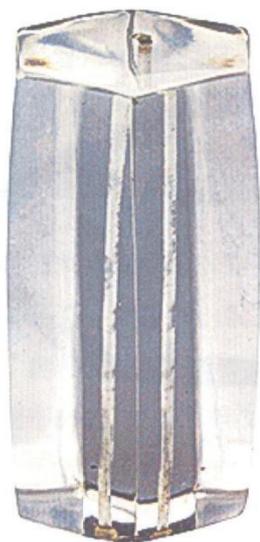
5. 蚀刻石髓扁平系领形珠饰（文昌塔生资仓 1 号墓）

图 4-3 域外输入的奇石异物（一）

3. 水晶珠饰

不同颜色的水晶，如白水晶、烟晶、紫晶、黄晶，合浦均有发现，以纯净、透明度高的白水晶居多，形状有管形、圆形、扁圆形、六方形、蝉形、系领形和多面体形等。望牛岭 1 号墓出土的蝉形水晶，长 7.3 厘米，宽 3.3 厘米，是目前广西发现的最大的一颗水晶。它以简练的线条，象征性地刻划出蝉的口、鼻、翅膀及腿部。望牛岭 1 号墓还出土了 1 颗六棱柱形水晶(图 4-4:1)，长 3.9 厘米，打磨光滑，晶莹剔透。紫水晶串饰单是黄泥岗 1 号墓的徐闻县令陈褒墓出土的数量就达 163 颗之多（图 4-4:2）。此外，紫水晶饰物还发现了 1 件三宝佩，出自风门岭 10 号墓。

仅供阅读 请勿侵权



1. 六棱柱形水晶（望牛岭1号墓）



2. 紫水晶串饰（黄泥岗1号墓）

图4-4 域外输入的奇石异物（二）

印度南部的德于高原是紫水晶的主要产地和加工中心。南于合浦地区没有可供开采的矿床，作者倾向于认为合浦汉墓出土的高质量白水晶珠饰是与紫水晶一并输入的，但白水晶还可能产自东南亚地区。

4. 绿柱石珠饰

风门岭10号墓出土的一串绿柱石珠饰，共24颗，质地纯净，其中海蓝宝石3颗，其余为透绿宝石。黄泥岗1号墓出土的一串混合串饰（图4-5:1），共23颗，原判断为水晶，但测试结果显示，除9颗水晶、1颗玉髓外，其余为包括海蓝宝石、金绿宝石和透绿宝石在内的绿柱石。类似的混合串饰，还见于北插江盐堆1号墓、凸鬼岭汽车齿轮厂17号墓和望牛岭1号墓等。

绿柱石在古罗马时期的需求量很大，普林尼在1世纪的《自然史》中记述，最好的绿柱石绝大多数来自印度。^[41]斯里兰卡的绿柱石资源丰富，也是传统的宝石加工区^[42]。合浦出土的绿柱石串饰，应来自南亚地区。

5. 琥珀珠饰

两广沿海出土的琥珀制品，以合浦居多，约40座汉墓出土了琥珀珠饰。北插江盐堆4号墓、5号墓和凸鬼岭饲料厂1号墓出土的琥珀珠饰为扁圆形、半圆形、榄形、扁壶形、葫芦形、瓜棱形等。风门岭27号墓、23B号墓和北插江盐堆1号墓等出土的琥珀动物形饰件为狮形，凸鬼岭汽车齿轮厂22号墓出土的则为鸽形。凸鬼岭汽车齿轮厂30B号墓出土的9颗琥珀珠饰和北插江盐堆1号墓出土的17颗（其中1颗保存较差，仅存残片）琥珀

珠饰(图4-5:2)中,除上述形状外,还有龟形、圆形、耳珥形和不规则形等。

这些琥珀质地致密,内少丝状碎裂纹,出土后经氧化颜色变黑,与缅甸出产的琥珀最为接近。^[43]此外,还见有应为来料加工的琥珀印章等。

6. 金饰

合浦汉墓出土的金器有带钩、戒指、珠饰及用于镶嵌的焊珠金箔等。珠饰包括十二面金珠(金花球)和棒槌形、葫芦形、瓜棱形、双锥形金珠,以及素面或表面焊珠缠花的榄形金珠、表面呈绞索形的扁圆形金珠等,其中五期岭3号墓出土的20颗金串饰(图4-5:3)中就包括十二面形、棒槌形、双锥形和扁圆形。合浦汉墓出土的十二面金珠共计30多颗,造型基本相同,均为圆球形、镂空,直径0.5~1.7厘米。其制法是先由圆形小金条焊接12个小圈,然后在小圈交会的三角地带,用高温吹凝的圆形小珠加以固定。在寮尾14号墓和环城砖厂1号墓各发现焊珠金箔2片。寮尾14号墓出土的焊珠金箔原镶嵌在剑格后木把的两侧,长仅2.1厘米,宽仅0.4厘米。焊珠金箔的制作更为精巧,先把黄金捶打成厚约0.1厘米的薄片,再以细小的金丝勾出轮廓,最后用剪成小段的金丝高温吹熔凝集成细密的小颗粒金珠焊接其上。每一片金箔上焊接的珠子达200多颗,大的直径0.74毫米,中的直径0.25毫米,小的直径仅0.1毫米。细看之下,无异于今日之微雕。

我国先秦时期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流行的是铸造成型或锻打成型,装饰花纹主要采用铸造、镌刻等手法。在西汉时期的大型墓葬中始发现采用掐丝和焊珠工艺的黄金制品,鉴于其出现的“突然性”,认为它们是外来物品是有道理的。^[44]十二面金珠在汉代的京畿地区尚无发现,在中国境内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也没有发现,仅出现在南方及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就其传入路线而言,最大的可能性是海路。十二面金珠的焊接工艺源自西方,古希腊麦锡尼则可能是起源地,其流传的路线也是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南海,自西向东而来。但从外形看,合浦所见的十二面金珠,与古希腊等地发现的器形相去较远,而与印度和东南亚出土者接近。因此,珠饰中采用掐丝和焊珠工艺的黄金制品如金花球等应是直接舶来,其余工艺较简单的金珠,或舶来,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当地自制。

7. 绿松石饰件

合浦汉墓所出土的绿松石动物饰件,均为象生器,有绵羊形和鸽形。绵羊形饰件(图4-5:4)出自西汉晚期的北插江盐堆1号墓,鸽形饰件出自文昌塔生资仓1号墓、凸鬼岭汽车齿轮厂17号墓和风门岭26号墓等,大小均约为长1.3厘米、高1厘米,质地纯净,打磨光滑,造型生动。一般的绿松石,湖北郧县一带也有出产,但漂亮的纯碧绿的高级绿松石,产地以葱岭两的乌兹别克撒马尔干附近、阿富汗和伊朗东北部为主,伊朗北部出产的绿松石最出名。^[45]结合玻璃器等伴出物来看,这些绿松石饰件从波斯等地经海路辗转输入的可能性很大。



1. 水晶、玉髓、绿柱石混合串饰（黄泥岗 1 号墓）



2. 琥珀珠饰（北插江盐堆 1 号墓）



3. 金串饰（五期岭 3 号墓）



4. 绿松石绵羊形饰件（北插江盐堆 1 号墓）

图 4-5 域外输入的奇石异物（三）

8. 香料

据不完全统计，合浦汉墓出土熏炉 54 件，其中陶质 33 件，铜质 21 件。风门岭 24B 号墓出土的陶熏炉，内有炭条（图 4-6）^[46]；堂排 2B 号墓的铜熏炉，“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47]。孙机认为，汉代南方的熏香习俗较北方为盛，中原地区熏炉的出现也相对晚一些，反映熏香的风气是自南往北逐步推广的，而高级香料最先是来自南海输入我国的。^[48]熏炉在合浦的广泛出现，意味着来自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及波斯等地的龙脑香，在汉代合浦的使用已较为普遍。



图 4-6 陶熏炉及炭化香料（风门岭 24B 号墓）

（四）非贸易品

陶壶和铜钹均出自寮尾 13B 号墓。这两件器物应为非贸易品，当为随身携带进入中国。该墓的墓主可能是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也有可能是客死合浦的“蕃客”。

青绿釉陶壶属低温釉陶，是典型的帕提亚时期的器物，制作地位于今伊拉克南部或伊朗西南部。^[49]这类陶器在大英博物馆和罗浮宫等有收藏，印度、泰国同时期的港口遗址，也发现有较多残片。合浦出土的这件汉代波斯陶壶（图 4-7:1），目前我国仅出土一件，弥足珍贵。比之前我国隋唐和五代的同类发现，至少要早上三四百年。

铜钹有“突”，穿孔可拴系钹带，面平可击奏，花纹中的羽人等题材也与其作为法器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可初步判断它是一种乐器，为单片形式的钹。^[50]钹源于西亚，较早在埃及、叙利亚出现，后在波斯、罗马等地流传；而在东方，则先见于印度，后见于中亚。合浦出土的这件铜钹（图 4-7:2），无论是纹饰，还是其中的砷铜成分，都赋予其强烈的中亚文化色彩，很可能是与波斯陶壶一并通过海路输入的。



1. 波斯陶壶



2. 铜钹

图 4-7 波斯陶壶与铜钹（寮尾 13B 号墓）

（五）外来文化因素的植入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之路，而且是文化交流和传播之路，一些域外的文化因素，经过模仿改造，由此植入本土文化中。这一点在合浦汉墓及其出土文物中有较充分的体现。

1. 胡人俑的艺术创作母题

“胡人”通常是指面部特征为“深目高鼻、络腮胡须”的人种。学术界认为胡人来自北方、西域和东南亚等广泛地域，因而各地出土的汉代胡人俑，其服饰、帽饰和容貌也会有所不同。

合浦西汉晚期堂排 1 号墓出土的胡人俑（图 4-8:1）为浅黄色软陶，俑残高 28.2 厘米，

其左手、左耳、足部与鼻梁均存在不同程度残缺，但造型和主要特征尚可辨识。^[51]俑头戴圆顶小帽，身着对襟小领长袍，竖眉小眼，深目高鼻，脸部较圆，络腮胡须。从俑的外貌观察，其状似舞俑，而怀中所抱，似为弓形竖琴。东汉晚期寮尾 13B 号墓出土的俑座灯（图 4-8:2）为灰色硬陶，通高 20 厘米。^[52]俑座为胡人形象，深目高鼻，尖下巴，络腮胡须。胡人屈膝而坐，左腿横曲，右腿竖曲，右手撑地，左手举托灯盘，头仰视，造型生动传神。不过，此俑的面相虽明显为胡人，但缠头绾结，又有如汉式的幞头。



1. 胡人俑（堂排 1 号墓） 2. 俑座灯（寮尾 13B 号墓）

图 4-8 陶俑

广州汉墓中，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后期的很长一个时期均有俑座灯和侍俑出土，其胡人形象也与合浦汉墓出土者相似，有研究者认为该胡人形象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族”接近，更有可能是来自西亚或非洲东岸。胡人俑的造型是否能明确源自这些地区，目前还不好定论，但无论如何，“胡人形象的制作，当非无本之木，而应存在现实的写照”。^[53]李刚在《汉晋胡俑及佛教初传中国摭遗》中提及，综观我国发现胡人俑的分布规律，是南方早于北方，沿海早于内地，而在数量上，东南沿海地区远远多于其他地区。^[54]从这一分布规律分析，“胡人”这一外来文化因素传播到中国的路径，应首推海路。合浦出现的胡人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中两海路贸易的扩大，与域外人种交流接触的增多，胡人的体质特征和文化特征为时人习见，进而运用，作为艺术创作的母题。

2. 羽人铜座灯与羽人形象

羽人铜座灯（图 4-9）出自九只岭 6A 号墓，年代属东汉晚期。灯通高 35.4 厘米，分灯盘、灯柱和灯座三段。灯盘为行灯的形状，盘圆形、直壁、平底，附三直足和柳叶形把。中段灯柱下为羽人，羽人短脸，浓眉大眼，高鼻大耳，络腮胡须。羽人胯前两侧刻有圆圈，双手覆压，似为把持乐器。双翼紧贴在背后，略为凸出。灯座上为圆形龙首状，龙嘴衔着的小圆柱捅进灯盘下面的套管，使灯盘自如转动，底座还铸有龙、虎、熊等瑞兽。^[55]

羽人是汉代艺术中常见的形象。汉代羽人与先秦羽人不同，大都长着两只高出头顶的大耳，造型大致可见四类：第一类，人首人身，肩背出翼，腿部生羽；第二类，人首鸟身，鸟爪；第三类，鸟（禽）首人身，人身生羽翼；第四类，人首兽身，身生羽翼。四类羽人当中，以第一类出现的频率最高，其他三类皆不多见。羽人常出现的图像组合中，或翱翔于云天，与天帝、雷公、雨师、风伯、电母等天庭诸神济济一堂；或出没于仙庭，与捣药玉兔、蟾蜍、九尾狐、三足鸟等灵瑞一同陪侍在西王母或东王公周围；或游戏于祥禽瑞兽中，与龙、虎、鹿、朱雀、凤凰、熊罴等祥瑞戏舞，很可能就是在演示既能巩固自身，亦能帮助众生延年益寿，甚至不老不死的行气导引之法。^[56]合浦铜座灯上的羽人，大体未脱离学者归纳的汉代羽人范畴，前述铜钹上的羽人属少见的第四类。而这件铜座灯上的，虽属常见的第一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一是双翼紧贴背后，与其他地区发现的羽翼飘出的类型不同；二是双耳没有高于头顶；三是双手似持有乐器。



图 4-9 羽人铜座灯（九只岭 6A 号墓）

可见，合浦发现的羽人形象与各地所见的有较大不同，显示出与西方密切的关联性。而且，另一件几乎雷同的羽人铜座灯，出土于相邻的广西梧州鹤头山东汉晚期墓。^[57]合浦

郡属交州刺史部，这一时期刺史部的治所就在梧州。^[58]亦即是说，目前发现的相同羽人形象仅局限于交州的范围。

3. 钵生莲花器与佛教传入

钵生莲花器在合浦共出土 14 件，除 1 件出土于汉墓，其余均出土于三国墓。钵生莲花器自上而下南莲花、钵和座足三部分构成。这类器物在此后的晋墓和南朝墓了无踪迹，说明其于东汉末年出现后，仅盛行于三国时代，而且就目前的发现，仅限于合浦一地。相较于东汉末期，三国墓出土的器物虽结构基本一致，但变化却很明显，器物变低矮，高度仅有 24~30 厘米，部分已简化为无底座，顶部的表现形式也更丰富。一些如凤门岭 1 号墓和公务员小区 8A 号墓所出土的钵生莲花器（图 4-10），仅作蕾状，也有些刻出了花瓣形状，还有些作含苞欲放状，后两者已能大致判断为莲花造型。



1. 凤门岭 1 号墓出土



2. 公务员小区 8A 号墓出土

图 4-10 钵生莲花器

钵生莲花器与佛教传入关系密切。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学者伯希和 (P. Pelliot) 作《牟子考》就佛教的传入直言，“当纪元一世纪时，云南及缅甸之通道，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经也”，且“南方教派成立之时，或在北方教派之前”。^[59]但反对者众，有学者甚至提出了“所谓的‘早期佛教的南传系统’的概念不能成立”^[60]。但在南方，考古发现的佛教遗物，特别是东汉及之前的遗存，正逐渐增多，是不争的事实。大量出土熏炉体现的汉人焚香习俗，吴焯认为是源自佛家礼仪，而且可能提供了一条目前尚不明朗的、佛教在中国南方早期传播的重要线索。^[61]合浦汉至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这批陶钵生莲花器，“反映出在东汉末期至三国时期，佛教已在合浦地区特别是在中上层扎根，并逐渐盛行，人们‘一心向佛’，且通过随葬品的形式，延续到阴间”^[62]。合浦汉墓

还出土了不少石榴子石、肉红石髓、琥珀等材质的狮形饰件，这类器物在东南亚地区也有较多发现。格洛弗认为，“极有可能是早期佛教图像，见证早期佛教思想和价值在东南亚的出现”^[63]。出土于风门岭 10 号墓的摩羯造型石榴子石饰件和三宝佩也是有力的佐证，摩羯造型肉红石髓饰件则出土于凸鬼岭汽车齿轮厂 16A 号墓。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动物，被认为是河水之精，是法力无边的海兽。摩羯纹饰常见于古印度的雕塑、绘画艺术之中，在寺院建筑的塔门上尤为多见。现知最早的摩羯纹饰大约出现于公元前 3 世纪中叶。象征佛、法、僧的三宝佩，以及作为法器的铜钹等，也应与佛教有关。三国时期，佛教在吴地进一步传播，广西贵港出土的铜镜上的黄道十二宫巨蟹和宝瓶图像，也是佛教海路传入中国南方的重要证据。^[64]

4. 叠涩穹窿顶的源流

叠涩穹窿顶的特点是下方上圆，在底部正方形的四角出挑数皮砖，形成弧面，再以砖层层出挑的方式成顶。叠涩穹窿顶主要见于岭南的广州、佛山、合浦、贵港、香港等地及越南的墓葬。在中原及其他地区，类似叠涩穹窿顶结构仅发现于河南襄城茨沟的一座画像石墓，似为孤例。^[65]而且岭南出现时间相对较早，广州汉墓中分别发现“建初元年”（76 年）、“永元九年”（97 年）等铭文砖。^[66]

合浦发现的叠涩穹窿顶汉墓较多，在统计的 110 座东汉晚期墓中，就有 20 座叠涩穹窿顶。年代较早的风门岭 10 号墓，呈圆锥形；而稍晚一些的叠涩穹窿顶，如坐落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一号保护棚内的四方岭 36 号墓，则呈隆圆形（图 4-11）。这种演变，可能与技术的进步有关。三国时期，叠涩穹窿顶不但得以延续，似乎还更为广泛，仅寮尾墓地 25 座三国墓中就有 7 座属于此类型。可见，叠涩穹窿顶是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合浦地区盛行的一种墓葬形制。



图 4-11 叠涩穹窿顶（四方岭 36 号墓）

不少研究者较早就注意到了叠涩穹窿顶的独特之处，常青指出，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世界上同时存在三个比较重要的砖石拱顶系统：一是古罗马系统，二是中亚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系统，三是西汉中叶后我国中原地区出现的砖石拱顶系统，而叠涩穹窿顶的做法与中亚同类结构完全相同。^[67]徐永利也提到海上丝绸之路与叠涩穹窿顶的关系，认为这

种技术来自域外。^[68]全洪在研究广州穹窿顶汉墓后认为,“广州是海路交通贸易的前沿港口,因而接触到西方穹顶的技术,受到某种启发和影响,从而发展出与罗马建筑形式更加接近的穹顶也是可以理解的,有可能的”^[69]。从时间节点和砖结构的结砌技术来看,合浦砖室墓在东汉早期就已出现,其渊源还是出自中原,但至东汉晚期出现叠涩穹窿顶这种造型,应是受到了域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应是通过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产生的,故其范围基本限于海路交通便利的两广沿海一带。

[1] [东汉]班固:《汉书·张骞传》卷六十一、《汉书·西南夷传》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62,第2694、3841页。

[2]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62,第1671页。

[3]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本(原书1937年出版),第2-3页。

[4]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缺卷逸文卷三,中华书局,1983,第1087页。

[5] 黄启臣:《徐闻是西汉南海丝绸之路的出海港》,《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阮应祺:《汉代徐闻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吴松弟:《两汉时期徐闻港的重要地位和崛起原因——从岭南的早期开发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岭南文史》2002年第2期;张荣芳、周永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6]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

[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年第9期。

[8] 崔勇:《徐闻二桥村汉代遗址与汉代徐闻港的关系》,《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

[9] 王杰:《汉代交州合浦港口的兴起与对外贸易》,《大连海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10] Lai Nghi Excavation Team. Excavations at Lai Nghi cemetery (Quang Nam province) the first season 2002 and the second season 2003.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finds. Hanoi: Social Sciences Publishers (in Vietnamese), 2004: 239-241.

[11] Andreas Reinecke. Nguyen Chieu & Lam Thi My Dung. Go Ma Voi: The New Discoveries of Sa Huynh Culture. Cologne: Linden sofi, 2002.

[12] Lam Thi My Dung. Some archaeological issues on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Sa Huynh to Champa in the coastal area of the central Vietnam. The Specific Research Project. 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Vietnam (in Vietnamese), 2000.

[13] Ian C. Glover, Mariko Yamagata & William Southworth. The Cham, Sa Huynh and Han in Early Vietnam: Excavations at Bun Chau Hill, Tra Kieu, 1993. Bulletin of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No. 14 (1996).

[14]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第643-644页。

[15] 蒋国学:《〈汉书·地理志〉中的都元国应在越南俄厄》,《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6期。

[16] Andreas Reinecke, Vin Laychour & Seng Sonetra. Prohear—An Iron Age Burial Site in Southeastern Cambodia: Preliminary Report after Three Excavations. Crossing Borders 21.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268-284.

[17] Miriam T. Stark. Angkor Borei and the archaeology of Cambodia's Mekong Delta, Art & Archaeology of Fun Nan: The Pre-Khmer Kingdom of the lower Mekong Valley.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3: 87-105.

- [18]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72,第1014页。
- [19] [唐]姚思廉:《梁书·扶南》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73,第787页。
- [20] 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 [21]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第421页。
- [22] 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主编《东南亚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75-182页。
- [23] Ian C. Glover. The Southern Silk Roa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early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Ancient Trade and Cultural Contacts in Southeast Asia*. Bangkok:Offi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Commission. 1996:57-94.
- [24] B é r é nice Bellina, P. Silapanth, B. Chaisuwan, etc. Th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polities in the upper Thai-Malay Peninsula in the late millennium BCE. *Before Siam: Essays in Art and Archaeology*. Bangkok:River Books, 2014:69-89.
- [25] Mercedes Murillo-Barroso, Thomas Oliver Pryce, B é r é nice Bellina, etc. Khao Sam Kaeo: An Archaeometallurgical Crossroads for Trans-asiatic Technological Tradition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37, 2010:1761-1772.
- [26] GLOVER, I. C., & B. BELLINA. Ban Don Ta Phet and Khao Sam Kaeo: The Earliest Indian Contacts Re-assessed. In MANGUIN & P., A. MANI.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arly Indian Influences in Southeast Asia: Reflections on Cross-cultural Movement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 [27] 碧姬·博雷尔(Brigitte Borell):《早期北部湾地区的汉代玻璃器皿》,载《海洋史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7-44页;班查·彭帕宁:《璀璨·古珠·天珠》(Beyond Beads),林璟玟译,维他命文化有限公司,2013,第103-106、137-151、177-182页。
- [28] 丁阳、黄海刚、王春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枢纽:克拉运河》,《亚太经济》2015年第3期。
- [29] B. Bellina, P. Silapanth, B. Chaisuwan, etc. Th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polities in the upper Thai-Malay Peninsula in the late millennium BCE. In book: *Before Siam: Essays in Art and Archaeology*, Edited by N. Revire & S. Murphy. Bangkok:River Books, 2014, pp. 69-89.
- [30] Vimala Begley, Arikamedu Reconsidered,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87, No. 4 (1983): 461-481.
- [31] J. Carswell. The Port of Mantai, Sri Lanka, in Roman and India, the Ancient Sea Trad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In SENAKE, B. et al. Mantai. Second Arikamedu: A Note on Roman Finds, in Sri Lanka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Colombo: the Sri Lanka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and Central Cultural Fund, 1991.
- [32]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2002,第285页。
- [33] 安志敏:《马来亚柔佛州出土的古代陶片》,《考古》1965年第6期。
- [34] 路线示意图参见熊昭明:《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第19页。
- [35]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第53-54页。
- [3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 [37]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第140页。
- [38] 任乃强:《我国黄金铸币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3期。
- [39] 据考证,摩羯源于印度神话和佛经,形象为“龙首鱼身”;摩羯源于黄道十二宫,最初为“羊首鱼身”的形象,后在译经过程中逐渐将二者混淆。见杨伯达:《摩羯、摩羯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
- [40] Peter Francis, Jr. Beadmaking at Arikamedu and beyond, *World Archaeology*, Vol. 23, No. 1. Jun, 1991.
- [41] K. Rajan, N. Athiyaman. Traditional gemstone cutting technology of Kongu region in Tamil Nadu. *Indian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39(4):385-414.
- [42] Junqing Dong, Yunling Han, Jiwang Ye, Qinghui Li, etc. In situ identification of gemstone beads

excavated from tombs of the Han Dynasties in Hepu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China using a portable Raman spectrometer. *J. Raman Spectrosc.* 2014, 45, 596-602.

- [43] 徐晓东:《琥珀及中国古代琥珀原料的来源》,《故宫学刊》2008年总第四辑。
- [44] 白云翔:《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舶来金银器述论》,载《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
- [45] 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第14页。
- [4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第91页。
- [4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
- [48]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第358页。
- [49] 黄珊、熊昭明、赵春燕:《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青绿釉陶壶研究》,《考古》2013年第8期。
- [50] 熊昭明:《广西合浦汉墓出土铜铍略考》,载《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第327-331页。
- [5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
- [52]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 [53] 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巴蜀书社,2007,第268页。
- [54] 李刚:《汉晋胡俑及佛教初传中国摭遗》,《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
- [5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报告中描述“底座制成三勇士各骑怪兽飞跃奔腾纹饰”,在近期清理锈斑后观察,有误。
- [56] 贺西林:《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文物》2010年第7期。
- [57] 梧州市博物馆:《广西梧州市近年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文物》1977年第2期。
- [58]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郡国五》,中华书局,1965,第3533页。引王范《交广春秋》曰:“交州治羸娄县,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210年)治番禺县。”
- [59] 伯希和(P. Pelliot):《车子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五编,商务印书馆(上海),1962,第160-183页。原作发表于1920年。
- [60] 姚崇新:《佛教海道传入说、滇缅道传入说辨正——兼论悬泉东汉浮屠简发现的意义》,载《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第459-496页。
- [61] 吴焯:《汉代人焚香为佛家礼仪说——兼论佛教在中国南方的早期传播》,《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 [6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度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第353-354页。
- [63] Ian C. Clover, “Early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a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World Trading System,”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ull, No. 16(1989): pp. 1-45.
- [64] 王煜、王欢:《三国时期吴地黄道十二宫图像试探》,《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4期。
- [6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 [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第368-375页。
- [67] 常青:《两汉砖石拱顶建筑探源》,《自然科学研究》1991年第3期。
- [68] 徐永利:《汉地砖砌穹窿起源刍议》,《建筑学报》2012年第S1期。
- [69]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文化遗产·考古发现卷》,文物出版社,2008,第170-181页。